

2009 年臺灣文學史研究回顧與展望*

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 黃美娥

一、前言

由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共同合力舉辦的年度臺灣史研究回顧與展望會議，今年業已邁入第三年。在前兩年中，臺灣文學領域被歸入社會文化研究範疇之內，起初曾與「音樂、戲曲、美術、女性議題」等類目一起進行合併討論，次年則是與「女性議題、語言研究」類目連結探討；至於本年度，由於考量到目前全臺所設臺灣文學系所不少，每年累積之研究成果亦豐碩可觀，在學科主體性已經確立，且日漸成熟穩定的情況下，大會決議將之獨立出來進行個別述評工作。不過，相較於前兩年所關照的是「臺灣文學」的研究狀況，本年度焦點則改易為「臺灣文學史」之研究，而所以會做出如此的調整，這一方面是顧及到目前國立臺灣文學館每年均進行年度文學年鑑的編纂工作，其中亦會涉及臺灣文學研究回顧一項，為免有所重複所致；而另一方面乃因，大會主辦單位係國內三所臺灣史研究所，就此而言，添入「歷史性」的分析向素，朝向以「文學史」視角做為研究評述的軸心，可能更符合大會角色的積極意義。為此之故，本年度的探索方向，便從「臺灣文學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入手。

但，從「臺灣文學研究」到「臺灣文學史研究」，其間差異何在？這自然攸關了何謂「文學史」的命題？箇中關鍵便在於「史」的作用力，因此本文所謂的「臺灣文學史」，在本質上須對歷史的時間性因素做出回應與勾連，亦即論著內容與論述質性要有具備隨著臺灣歷史前進而產生演變發展之況味，唯有如此方可成為本文之研究對象與材料。正因為如此，本文所欲剖析者便不同於一般之作家論、作品論，或文學社群、文學思潮、文學現象、創作美學等研究議題，儘管這些實際也是構成一部臺灣文學史之有機要件，不過由於要在文學研究與文學史研究之間做出更明確的區別，因此上述型態之研究成果將會略去不論。在此種情況之下，2009 年度所曾出版的若干臺灣文學新研究著作，如李育霖《翻譯闖境：主體、倫理、美學》、林淑慧《禮俗·記憶與啓蒙—臺灣文獻的文化論述及數位典藏》、須文蔚《臺灣文學傳播論：以作家、評論者與文學社群為中心》等，雖然不乏精彩洞見，但因內容非關文學史性質之研究，遂不予以討論。

因此，相關論著撰稿人的文學「史」之意識的表露，便成為本文篩選研究對象時的重要評斷，而能符合此一標準者，大致如下：其一，論著已在題目上清楚標誌「文學史」字樣，能高度傳達論述者本身在從事相關研究時的自覺性，例如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所撰《臺灣原住民族文學史綱》；其二，論著題目

* 本文撰寫過程中，臺灣師範大學臺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博士生王俐茹同學協助搜尋、影印相關資料，並整理部分文章內容要點，特此致謝。

雖未顯，但所述內容其實已經具備類文學史性質者，如江寶釵等人所撰《臺灣全志·文學篇》；其三，論著題目雖未註明屬於文學史之作，但題目上出現有具歷史演進意義的時間性標記，如朱雙一《百年臺灣文學散點透視》；其四則是不管題目有無顯示文學史的歷史時間性，但因論著內容能夠體踐臺灣文學在歷史軌跡上的發展過程者，則亦屬本文所欲關注者，如林以衡《日治時期臺灣漢文俠敘事的階段性發展及其文化意涵：以報刊作品為考察對象》；其五，論述內容涉及了臺灣文學史研究的史觀、方法論、詮釋框架與相關理論的思考，如陳建忠〈臺灣歷史小說研究芻議：關於研究史、認識論與方法論的反思〉等。以上，凡具備上述條件者，本文皆將之視為文學史之相關著述，並進一步納為研究材料。

於是，在上述義界說明與制約篩選下，本文最終揀擇出有關臺灣文學史研究著述共計有專書 14 種，單篇論文 13 篇，博碩士學位論文 18 篇，詳見文末所附目錄。不過要加補述的是，由於在一開始蒐羅臺灣文學研究文獻目錄時的可能遺漏，以及受制於進行釐辨研究材料是否具有文學史屬性的主觀判準，本文所列 2009 年度臺灣文學史著述目錄勢必無法周全，於此特加說明。

二、從清領到戰後的斷代文學史研究

掌握了本文有關研究材料的去取原則之後，那麼 2009 年度相關臺灣文學史著述，究竟如何具體展現臺灣文學在歷史軌跡上的發展過程？這可透過以下多種著述，從中發現「斷代文學史」的研究與討論，是最為明顯的論述操作模式。

（一） 清領時期

有關清領時期臺灣古典文學史相關研究，在 2009 年度受到青睞不多，所得僅有二篇。其一，楊書瑋〈台灣清治末期（1871-1895）散文中的文化論述研究〉，該文針對清末臺灣散文進行探討，撰寫者身份計有臺灣本土文人、中國流寓文人與西方人士之作，散文內容實際所論包含政治與教育的議論、產業經濟的評論與民情風俗的評述三面向，研究者發現這些散文的文化論述，往往出自於帝國之眼（清帝國、西方帝國）的觀看視角與二元對立論述模式，故不難想見清末臺灣所具的文化位階。此文所得結論扼要，另亦令人可喜的是，由於目前有關臺灣文學與現代性間關係的討論，一般多從日治時期進行探索，本文則分析了清末時期臺灣初具的現代性社會圖像，故可供連結參考。

其二，顧敏耀〈文學想像與地理真實的重層互文—臺灣清領時期詩文中的日月潭書寫〉，此文為《2009 南投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之作。文章原屬主題學之研究，但其選用討論材料，始自康熙時期季麒光〈臺灣雜記〉，終於光緒時期蔣師轍《臺游日記》，合計 26 筆，因為從中可見創作旨趣與書寫藝術之歷時性變化，因此本文列為文學史研究之素材。而從文章中，最終可以獲知整個清領時期關於日月潭的詩文寫作，除了鄧傳安與劉韻珂外，幾乎都缺乏實際遊歷現場之經驗，所作多具傳聞與想像而來，且特定主題與詩歌文化符碼尚有重複出現之

現象，導致再現與虛擬難分，而這也是日月潭形象在清代臺灣詩歌中的塑造過程與遞嬗軌跡。而在日月潭已成熱門旅遊景點的今日，本文所述頗具探源意義，通篇有其可觀之處。

（二） 日治時期

日治時期臺灣文學斷代史是 2009 年度研究者的耕耘重點，相關成果不少，這其中除了專書之外，尚有多篇學位論文。

1. 專書

首先，關於專書部分有四。其一，朱惠足之《「現代」的移植與翻譯：日治時期臺灣小說的後殖民思考》，此書以 1920 年代至 40 年代的臺人與日人小說文本為分析材料，結合「後殖民」與「現代性」的方法論，探討『現代』在日治臺灣文學發展中的跨界/移植/翻譯樣貌；而由於作者使用了各時期的小說文本，故得以為此串連起整個日治時代的臺灣文學發展脈絡，因之本文視同斷代文學史之著作。大抵，書中清楚標誌出臺灣的現代性移植經驗，是在西洋、中、日的「間隙」中形構的，如此的描述與修辭，十分生動地傳達了臺灣現代性的來源情形與存在樣態，格外看出臺灣現代性跨界「移植」時的特殊面貌。又因為書中重視移植經驗，故相較過去亦為臺灣小說後殖民思考所標舉的「本土論」挖掘，本書更強調了「在地化」經驗的齟齬、隔閡，或溝通、交流感受，因此而有了更為細膩的考察。

其二，柳書琴《荊棘之道：臺灣旅日青年的文學活動與文化抗爭》，該書乃增補其早年博士論文而來，內容較前更顯豐富而深刻。全書架構綿密，觀察對象雖然主要集中於 1933 年於日本東京所成立的「臺灣藝術研究會與機關誌《福爾摩沙》(フォルモサ)，本應歸屬於文學社群之研究，但所論係從該集團成立之前身「東京臺灣人文化サクル(circle, 同好會)」談起，卒至張文環投身皇民化時期臺灣本土文壇最後堡壘《台灣文學》，以及集團系統作家們對於 1940 年代臺灣文壇之影響關係與介入情形，因此已然勾勒了 1930 至 1940 年代日治臺灣文學斷代史之風貌，故本文納入探析。而在此書中，作者透過多種珍貴歷史資料與詳細閱讀作家文學作品，不僅能對福爾摩沙集團成立與發展過程，進行深入闡述，且對若干福爾摩沙系統作家，包括謝春木、王白淵、張文環、巫永福、吳坤煌……等之旅日概況與心靈狀態，做出精彩詮釋與感性刻畫，由於上述作家正係日治時期臺灣重要日文作家群，故本書所論對於相關重要作家個案研究極有貢獻，值得高度肯定。再者，書中曾就臺灣旅日青年在東京時，與中國左翼作家東京聯盟以及日本左翼作家、左翼詩壇間之往來情形，有所著墨與鋪陳，此點對於臺灣左翼文學系譜之描繪與東亞左翼文學的跨界關係研究，深具意義，較之過往日治臺灣左翼文學研究成果，已取得更大突破。

其三，為新生代研究者謝崇耀所撰之《百年風華新視野—日治時期臺灣漢文學及文化論集》，謝氏頗具學術活力，積極致力研究，此書專就日治時代臺灣漢文學而發，析論了「漢文化之調適與傳播」、「殖民體制之影響與新宦遊文人」、

「漢文學的重整、開拓與新局」三部分，而實際內容涵蓋議題頗為多元，包括新學會、日本來臺漢文人、詩話、詩社、崇聖道德報……等，這除了可展現出日治時代「漢文學」研究的豐厚內蘊外，同時更體現了研究者關注面相的多樣化，可知前人研究潛力。另外，書中關於森鷗外與小泉盜泉在臺作品之探討，亦有不錯而穩健之分析，得為目前漸受關注的殖民地時期臺、日漢文關係議題，增添新研究成果。

其四，則係同屬新生代研究者林以衡所著之《日治時期臺灣漢文俠敘事的階段性發展及其文化意涵：以報刊作品為考察對象》一書，此書由其碩士論文增補修改完成。過去以來，有關日治時期的臺灣文學，一般多側重雅文學之發展與研究，而忽略了通俗文學存在的事實，尤其戰後有關臺灣通俗文學之相關著述，亦未追溯此一發軔於殖民地時期的開端歷程，因此目前學界所知仍少；實際上，蘊藏其中的偵探小說、言情小說、志怪小說、武俠小說等，為數眾多，而相關小說類型論、作家創作論、作品生產/消費現象、媒體傳播途徑、讀者反應，乃至與時代、社會、政權之間的文學/文化政治……等面向，都值得高度關注，而林以衡此書，正是目前所見專論日治時期臺灣武俠小說的奠基之作，也是上述諸多攸關臺灣通俗小說場域問題的初步探究與實踐。書中行文有條不紊，論述中肯平實，尤其論者經由大量報刊作品之努力耙梳、歸納，清楚釐析了日治時期臺灣俠敘事的發展輪廓及其文化意涵，而所附錄的相關俠敘事目錄，更顯現了日治時期臺灣武俠小說獨具一格的奇麗瑰采，也因此得以開展出與戰後臺灣武俠小說發展脈絡相互對話、銜承的契機，對於形塑臺灣武俠小說史研究的新局有所助益，因此別具意義與價值。

2. 論文

日治時期臺灣新文學研究，在 2009 年度成為學位論文的聚焦重點，其中 1930 至 1940 年代的階段研究，更是主要的論點所在。在這之中，包括有：蘇世昌〈1920-1937 台灣新知識份子思想風貌研究〉、趙勳達〈「文藝大眾化」的三線糾葛：一九三〇年代台灣左、右翼知識份子與新傳統主義者的文化思維及其角力〉、蔡佳潏〈1930 年代台灣與中國大陸的「文藝大眾化」論述探討〉、李敏忠〈殖民地風景的書寫：1930 年代臺灣白話小說文體風格研究〉、陳淑容〈戰爭前期台灣文學場域的形成與發展：以報紙文藝欄為中心（1937-40）〉、李文卿〈共榮的想像：帝國日本與大東亞文學圈(1937-1945)〉等博、碩士論文。而由上述諸文內容看來，撰者在面對 1930 至 1940 年代的臺灣文學史時，各自提出了角度不同，但皆具清晰問題意識之探索視角，計有：新知識份子思想風貌之討論、文藝大眾化問題的探析、白話小說文體風格的剖析、報刊媒體與戰爭前期文學場域的生成，以及從臺灣位置出發觀看帝國日本與大東亞文學圈的關係性，如此琳琅滿目的分析向度，在彼此共構但又交錯、相異的研究框架中，相互激盪，促使了 1930-40 年代臺灣文學史之內在肌理與外在輪廓，有了更為鮮明的顯豁，這是 2009 年度難得的集體性研究成果。

而在研究所得方面，在關照臺灣本地文學史發展狀態時，幾位撰寫者都能善用多種報刊雜誌資料，藉以進行紮實的評述工作，如蘇世昌有關臺灣新知識份子思想風貌之研究，從其製作之附表，便可得見相關努力情形。其次，這些學位論文也能嘗試援引不同的詮釋框架進行文學史的新考掘工作，例如趙勳達借重台灣在地左、右翼知識份子與新傳統主義者三者之間的角力關係，去彰顯 1930 年代臺灣島內文藝大眾化問題的複雜與糾葛，而蔡佳潏則是與中國「文藝大眾化」論述並置齊觀，並對兩地論述之同異處，做出極有條理的比較說明；至於李文卿論文，更是以宏觀的角度來檢視日本與亞洲各國的互動、接觸與統治關係，探索日本大東亞共榮圈之建構概念及其形塑的東亞文學觀，與大東亞共榮圈各地域對於此所衍伸出的知識、權力、文化關係的接受與質變，在論文中更分章細究大東亞共榮圈下五個漢字使用地域，包括台灣、朝鮮、滿洲國、中國（華北、華中）等，在大東亞想像下的文學樣貌與實際內涵，由於有關朝鮮、滿洲國、中國淪陷區等地的相關文學情境與處境，在台灣迄今仍成果鮮少，故本篇之作，甚具開拓性之意義與價值。至於李敏忠所著墨的白話小說文體風格論，則有利於為向來較偏於文化研究的臺灣文學研究趨向，開展出具有文學藝術審美意義之分析向度，且除可掌握 1930 年代小說風格外，也有益於理解若干作家個別創作文風。他如陳淑容之作，則是透過《臺灣日日新報》、《台灣日報》、《臺灣新聞》、《臺灣新民報》的文藝欄資料，分析漢文欄廢止之後到 1940 年間，台日作家在上述報刊中的場域互動與競爭關係，此外更藉由《臺灣新民報》的「新銳中篇創作集」的編輯與創作意義，針對過去眾所周知的龍瑛宗宣稱的「文學之夜」或黃得時「沒有文學雜誌，也沒有文學活動」的空白文學史，進行商榷與補白。

（三） 戰後階段

承繼日治時代臺灣文學史之後，便進入了戰後迄今階段，而 2009 年度相關研究數量不少，以下特別從中挑選兩個較具研究意義之面向，予以說明如下：

1. 從戰前跨到戰後的文學史分析向度

有關戰後初期臺灣文學史研究，在 2009 年度出現了徐秀慧《戰後初期（1945-1949）臺灣文化場域與文學思潮》與黃惠禎《左翼批判精神的鍛接：四〇年代楊逵文學與思想的歷史研究》兩本研究專書。首先，關於徐秀慧之專著，係由其博士論文修改完成而來，書中對於戰後官方文化體制對於臺灣文學場域的影響，國共內戰官方派系權力鬥爭與臺灣文學政治的牽連，官民之間社會重組與文化重編的複雜權力較勁過程的還原，處理出色；此外，新現實主義與魯迅熱潮湧現的意義，以及二二八事件前後臺灣政治環境與文學思潮情形，亦有縝密的剖析，本書是近年來有關戰後初期臺灣文學史研究中不錯之佳作。至於黃惠禎之作，乃針對楊逵其人其作進行專論，書中透過豐富的史料耙梳，以及前行研究通盤的掌握與對話，詳實探索了楊逵在 1940 年代間置身於社會運動與文學活動之間的鮮明身影，文中由楊逵在三〇年代的實踐情形談起，次而說明其對戰時文壇的種種反應，接著析論戰後初期對於臺灣新文學的關注與重建工作，除了給予楊

達高度讚賞之餘，但也不忘正視楊達的數番改稿，以及其與皇民文學、台共的複雜糾葛關係，展現行文的持平與客觀態度。其次，本書以四〇年代做為研究時限，而如此的考量，一方面既延續了撰稿人早期有關日治時期楊達研究之所得，同時也因為跨越了戰前與戰後，遂使得楊達思想的銜承轉化現象能獲得更細緻的考察，如此正有利於提醒現階段臺灣文學史往往以日治時期、戰後階段為時限區分的研究模式，所可能存在的盲點，而這也是本書重要意義所在。

而在專書之外，尚有蔡錦堂（1940年代雜誌《杏》（1943-1948）與其讀書會菁英們）一文，該文藉由在進行口述歷史訪談時，所發現的《杏》雜誌（此係1943年由台北高等學校學生與台北多所學校男女學生共組的讀書會所出版的內部雜誌，原共計11期，目前持有人留有6期）談起，除介紹讀書會的發起與《杏》的創刊經過，以及讀書會歷經戰前、戰後的時代性意義外，另也旁及讀書會的實際進行情況與《杏》目次內容與概要意義。不過，蔡氏論文主要在於引介當年參與讀書會的男女菁英份子，但因為文中附錄有《杏》的目次，以及明確指出此雜誌以詩、歌、俳句或其他類型之文學創作為主，因此得為1940年代戰前、戰後臺人自編文藝雜誌再添一筆，而此一由戰前跨至戰後的雜誌的出現，更提醒了吾人1945年不定然是戰前戰後文學歷史的斷裂線。要再附帶一提的是，論者在簡介讀書會與《杏》雜誌之前，所順道言及的與台北高等學校有關日人、臺人所編刊物如《足跡》、《南方文學》、《文藝批判》、《月來香》、《台高》、《翔風》，或是《杏》之附屬刊物或關連性刊物《罌粟》、《白雲》等，則是開啓了過去日治後期到戰後初期文學史中，鮮為人知的學院派文藝刊物研究，誠屬本文重要意義與價值之所在。

2. 以1950年代為發端的研究成果

從2009年度研究成果來看，不難發現戰後的臺灣文學史研究，其數量依然遠遠超過其他時期，不過較引人注意的是，研究取向從過去較為關注的80-90年代之現代文學論，開始轉而回顧1950年代的文學史論述，而各文所累積的成果，不只涵蓋了歷史材料的發掘，對於50年代臺灣文學史論述更有細部刻劃與開展，展現出極為豐沛的研究能量。

在相關研究中，散文與小說的斷代史研究是其中一個亮點。王鈺婷〈抒情之承繼，傳統之演繹：五〇年代女性散文家美學風格及其策略運用〉，不同於過去學界研究有得的反共文學與傷痕文學論述方向，文中從1950年代女性書寫數量最為可觀的抒情散文創作現象入手，分由文化體制、生產建置網絡、現代性三方面進行討論，進以考究女性抒情散文在1950年代文學場域中的獨特位置。而其研究發現：其一，當時的女性散文家無法置身官方潮流之外，故實際也參與了主流文化主導的文藝體制之中；其二，女性抒情散文發表場域主要集中於報紙副刊之中，而一旦選擇此等場域位置落腳，也就決定了這是由政治駕馭與市場主導雙重生產機制形構下的產物，則其間所顯露的文藝品味，便不難理解乃屬於一種抒情傳統的通俗美學型態；其三，女性散文家的抒情傳統與50年代中後期現代主

義思潮之間存有辯證、協商關係。大抵以上所得，相較過去學界有關臺灣女性散文研究，多半屬於作家作品論，或是散文類型論之研究，本文能夠另闢蹊徑，省思 1950 年代時代背景與官方文化歷史潮流之意義，而文章由美學風格、發表場域、省籍與性別、現代性、中國性等視角，所交錯建立起新的詮釋框架，更使女性散文的創作活動及其相關現象為之產生動態的活化，此外又能兼顧散文創作現象背後的種種文化結構意涵，遂能展現研究新意，令人可喜。另外，侯如綺〈臺灣外省小說家的離散與敘述(1950-1987)〉，亦以 1950 年代為研究起點，她留意由此至 1987 年解嚴止，兩代外省小說家所寫的離散來臺經驗及其敘述樣貌；雖然，族群、離散、臺灣書寫與國家認同諸議題，先前相關論著已經不少，但本文作者對於小說文本的大量閱讀與細膩詮釋，仍令人印象深刻。

至於另一條亦由 50 年代肇端的討論軸線，則是以報刊為觀察基礎的文學史論述，如吳宜玲〈由《東方少年》月刊論五〇年代台灣的兒童文化〉、張毓如〈乘著日常生活的列車前進：以戰後二十年間的《暢流》半月刊為考察中心〉等，這些研究雖然顯現了國家權力如何藉由報刊媒體在戰後臺灣文壇發揮影響與箝制作用，但其實猶有縫隙存焉，因此可以考察到不同以往的 50 年代文學史的反共論述角度。例如張毓如對於《暢流》所做研究，她以 1950 年到 1960 年長達二十年的雜誌進行分析，以為《暢流》所刊對於文學、歷史、科學文章的無所不包，故恰恰反映了 50 年代對於日常生活的重視，而非想像中被沈重的反共國族論述所充斥。而吳宜玲對於兒童雜誌代表《東方少年》的研究上，也出現類似的發現，文中認為由台灣文化協進會成員創辦的《東方少年》，為當時臺灣文藝工作者黃得時、楊雲萍等人提供了創作的園地，這項的研究與說明，除了彰顯《東方少年》中的臺灣本土色彩外，更有助於進一步認識本省作家在 50 年代臺灣文壇位置的問題。此外，同樣以 1950 年代為研究開端者尚有黃冠翔〈臺灣作家的香港書寫（1950-2008）〉，該文有鑑於 1949 年底為台、港文學關係發展的重要關鍵一年，此後在歷史、政治、文化場域上二者均有微妙之關連性，因此文中便從 1950 年起開始觀察臺灣作家筆下的香港書寫，以此掌握至 2008 年間夏濟安、邱永漢、趙滋藩、余光中、朱天文、施叔青、易之琳、蔡珠兒等人眼中的香港圖像與文化記憶。大抵，綜合上述多篇論文，可以獲知 1950 年代在台灣文學史研究上的時間性與空間性意義，諸文研究所得，指出了重新認識 1950 年代的必要性與重要性。

而除了前述文章之外，封德屏〈國民黨文藝政策及其實踐(1928~1981)〉、李知灝〈戰後臺灣古典詩書寫場域之變遷及其創作研究〉二文，所論雖非以 1950 年代為起點，但文中同樣涵蓋了該階段的文學樣貌。以封德屏〈國民黨文藝政策及其實踐(1928~1981)〉一文而言，討論的是中國國民黨之文藝政策及其實踐狀態，此篇論文題目宏觀，命題立意甚佳，通篇概述了 1928-1981 年間國民黨文藝政策的制訂、相關文藝體制的建置、文藝政策的推動與對臺灣文學的影響情形，行文架構分明，各章所述切要，最終所獲結論以為：「在社會環境快速變遷下，國民黨來臺後的文藝政策，沒有相對的快速調整，以致其對臺灣文學及社會曾有

的正面意義，也在長期意識型態的二元對立下，被漠視、被消解」。而李知灝〈戰後臺灣古典詩書寫場域之變遷及其創作研究〉一文，由於有關台灣古典文學戰後迄今的發展與變化，目前學界討論較少，故此文蒐羅了為數可觀的詩集作品，進以建構戰後台灣古典詩歌書寫場域，並針對相關詩歌創作書寫予以剖析，在研究方向上有其開拓性意義與價值；其次在論述方面，文中對於戰後若干民間詩社活動描述深刻，顯示能深入地方傳統，此亦值得肯定。

總體而言，在 2009 年度的相關研究中，一方面可以發現研究者投身各斷代文學史研究的努力與巧思，特別是 1930-50 年代有了較前更為深化與更新的創見，另一方面則可見對於報刊研究的依賴程度日漸加深，這已然成為進行文學史認識論的重要媒介基礎。

三、多種文學史的書寫實踐以及相關理論思考

(一) 文學史的書寫實踐及其史觀

2009 年度最值得喝采的文學史盛事，應當是由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所獨力完成近七十萬字《臺灣原住民族文學史綱》一書的出版，這名為史綱的鉅著的發行，既是原住民族群的大事，同時也為臺灣文學史之書寫劃下里程碑。

細繹此書的完成，其實反映了臺灣原住民主體建構的歷程，在 1980 年代末「還我土地」、「還我姓名」等原住民社會運動的影響下，文學史場域當中也出現找尋原住民主體的呼聲。而從早期孫大川談論原住民文學的「可能」¹，到浦忠成嘗試寫下〈原住民文學概述〉²，其間已歷經多重嘗試與辯證，這包括了原住民藉由文學論述找尋自我主體，或思考漢文化對於原住民本身位置的影響與衝擊，從中可以見到當代原住民知識份子如何展開區異思辨，以尋找自我主體定位的努力過程。

這樣的情況直到 2005 年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以「原住民族文學」定為文學主體的論述主軸後³，「原住民族文學史」便成為一種新的前進方向，也因此，2009 年《臺灣原住民族文學史綱》的誕生，絕對是漫長思索後的書寫實踐結果，巴蘇亞·博伊哲努最終選擇以民族文學史的書寫姿態，從過去被歸列於「臺灣文學」項下的「原住民文學」脫離出來，並獨立發展出具自我文學主體性的原住民族文學史。他認為：「由於兩者之間、文化背景與歷史經驗等都有相當的差異，發展的脈絡也有所不同，所以如果貿然將原住民族文學納入現在台灣學界一般所稱的『臺灣文學』範疇，將會窄化原住民族文學……」（頁 34），甚至以為：「臺灣原住民族由於遭遇的情境與世界上有許多的原住民族有許多類似之處，在文學的表達與訴求上，經常有雷同者，所以在這層意義上，臺灣原住民族文學與世界原住民族文學又能放在同一類的範圍，即第四世界的文學。」（頁 34）

1 孫大川，〈原住民文化歷史與心靈世界的摹寫--試論原住民文學的可能〉，《中外文學》21：7（1992.12），頁 152-178。

2 浦忠成，〈臺灣原住民文學概述〉，《文學臺灣》20 期（1996.10），頁 190-202。

3 巴蘇亞·博伊哲努，〈什麼是原住民族文學〉，《中外文學》34：4（2005.9），頁 171-192。

顯然，隨著巴蘇亞·博伊哲努此書的完成，臺灣文學史中屬於原住民族群的文學，其發展樣貌得以清晰浮出地表，然而此書作者所關心的，恰恰不是如何得與臺灣文學史作一更為緊密的有機性的連結，其更要指出的是二者之間的齟齬性，則如此正昭示了原住民族文學史與臺灣文學史之間的關係，需要一番重新調整與解釋。

在闡述了《臺灣原住民族文學史綱》此書所立基的原住民族群主體性史觀之後，要再加說明的是有關本書的章節架構及其詮釋框架。巴蘇亞·博伊哲努用心思考之後的安排是，內容共分上下二卷，卷一為「口傳文學時期」，卷二「使用文字之後的原住民文學」，此書不再輕描淡寫過去常被臺灣文學史家所忽略的口傳文學，反而如謝世忠在書前之序所述：「九講口傳文學，五講（當代）作家文學，後者少了近半，足見作者重視傳統的程度。⁴」作者深切體認了口傳文學的傳統性是原住民族文學的根本，也是與漢人文學的主要差異所在，更是新/現代原住民文學茁壯的必要土壤。只是，不以文字傳承而依賴口傳的口傳文學，究竟要如何被書寫進入文學史？而更大的挑戰是，眾所周知口傳文學的主要特徵是集體性與變異性，然而此類作品之時間性卻十分模稜，那麼要怎樣才能爬梳其中的發展歷程變化，進以回應文學史最基本的「史」的時間性結構問題？對此，巴蘇亞·博伊哲努觀察到若干口傳文學往往與時間脈絡裡的重大事件有關，原住民常常將對於這種具時間性意義的事件的感知與反應，寄託在與事件發生時相關的空間裡（譬如高山、平野、巨石、洞穴等），所以藉由逆反口傳文學中對於上述空間、事件的表述，是重塑口傳文學時間性的方法論，因此在本書中最終嘗試賦予口傳文學一個歷史發展脈絡，在參照口傳文學的母題情節之後，依次分為混沌時期的神話敘述、洪水肆虐的記憶、家族部落的建立與文明起源、山川名稱與文學想像、奇異的人與世界、部落戰爭的故事、傳奇人物與故事、動物植物與人、接觸與探索的時代等。至於，有關以文字書寫的原住民族文學，相較過去早期多從六〇年代陳英雄與其小說集《域外夢痕》談起的源頭論，本書透過了史料之挖掘，而改由日治時代論起，因此別有一番新面目。

此外，除《臺灣原住民族文學史綱》一書外，在 2009 年度尚有兩本文學史《臺灣全誌·文學篇》與《南投縣文學發展史·上卷》的出版，前者撰稿人為江寶釵、陳建忠、李知灝、陳國偉、許劍橋，後者參與者有李瑞騰、林淑貞、顧敏耀、羅秀美、陳政彥等人。關於《臺灣全誌·文學篇》，此書本為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所編方志中有關文學篇之成果，但依據文中所述（頁 21）：「方志的撰寫不同於一般文學史的撰寫，這是基本常識，方志將價值含蘊於選文之中，撰者的論述極少。然而，在今天的『文化全志』的規模下，這樣做是不可能的。……本篇將重點放在沿革與流變，亦留心文獻材料，但並不作文本材料的編纂。……由於是『文學史』，『時間』成爲本書最基本的關懷。」從上段文字明確可知，撰述者乃將本書當成文學史而非一般地方志書來書寫。而有關本書所寫臺灣文學史，乃由 1945 年起至 2006 年止（頁 21），各章節以類型分立爲民間文學、古典文學、

⁴ 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臺灣原住民族文學史綱》（臺北：里仁，2009），頁 8。

與現代文學三部分，其中現代文學又分跨越差異期、反攻復國期、認同追尋期、眾聲喧嘩期四個階段予以分述。此書相較過去以後殖民史觀撰寫而成的葉石濤《臺灣文學史綱》、彭瑞金《臺灣新文學運動四十年》或陳芳明《臺灣新文學史》，強調不以壓迫/反抗論述綱領為詮釋框架，而且還要在雅文學之外，加入通俗文學（頁 17），以顯現新意；至於對於何謂「臺灣文學」的判準，則以黃得時在日治時期所寫〈臺灣文學史序說〉中之說法為依據。

而從目前撰寫成果來看，其中如戰後初期文學史部分，由於早期研究對於期刊政論散文討論有限，本書能夠予以突出化，並列出專節討論，可見對於相關研究成果掌握深刻，故能設法後出轉精，尋求突破；至於科幻文學與網路文學之評述，也屬過往文學史未能耕耘者，此點之探討亦難能可貴。另外，本書與《臺灣原住民族文學史綱》同樣處理了口傳文學此一區塊，因為《臺灣全誌·文學篇》乃屬於戰後臺灣現代文學史之書寫，故當要評述這些原先缺乏時間感的口傳文學時，本書解決的方式是，配合實際的研究時限，利用當時新近採集的口傳文學成果，以及當代學者最新研究結果予以輔助詮釋，進以此呈顯口傳文學的「現代感」的時間性，以求符合現當代文學史的「現代時間性」，此等處理方式，頗堪玩味。

再者，有關另一本文學史《南投縣文學發展史·上卷》，這乃屬於區域文學史之撰寫，過去彰化、台中、嘉義、苗栗、高雄等地已陸續出版相關著作，故本書的出版，得為臺灣區域文學史之書寫再添一筆。而有關本書的撰稿理念與文學史觀，參照書前李瑞騰所撰導言（頁 1-3），可以得知在撰述南投文學發展史時，係以臺灣史/臺灣文學史為參照，這是慮及區域文學史不可能置身於島外，故有關歷史分期或文類興衰變化，自然亦需取鏡前者。其次，在作家作品的篩選上，本書所持標準為，若有他地文人書寫與南投有關者仍予以列入，而南投文人作家前往他地、他國所發生或參與之文學活動與創作，亦會納入討論，大抵是抱持著有助增益南投文學廣度的選擇態度。又，本書目前所寫內容起自早期史前、荷西時代，迄於日治時代止，主要含括口傳文學、清領時期漢語古典詩文、日治時期漢語古典詩文、日治時期新文學，行文時除文人作家社群與相關活動之說明外，主要採取作家作品論方式呈顯，大抵各章結構平均，能透過田野調查，挖掘若干珍貴文獻；另，關於口傳文學之介紹亦見用心，因為考量南投境內之多族群緣故，故書中首章同時觸及了原住民族、河洛與客家之口傳文學，如此實有利於凸顯本地之區域色彩與族群特色。

（二）文學史相關理論、研究方法論的思考

正如上述，2009 年度一共出現了三種文學史著作，而這顯示撰寫文學史是當前頗受學界重視之研究工作。但，不僅於此，相關文學史理論或研究方法論之探討，在本年度亦受矚目。

不同於浦忠成從族群立場引燃對臺灣文學史論述的挑戰，呂興昌〈母語書寫的正常化—白話字文學在臺灣文學史上的定位〉和方耀乾〈少數文學史書寫理論 e 思考—以台語文學為論述中心〉二文，則是因為語言文字的使用問題，同樣表

達了他們現對有臺灣文學史的不滿，他們二人所憂心的是，相較於過往臺灣文學史中漢字文本的被大量討論，母語/台語創作無疑是以一種「缺席」的狀態而存在，由於擔心母語/台語文學被消音，故研究者要努力對抗以漢字中心為本位的臺灣文學史的偏見與侷促。

在呂興昌的文章中，其所試圖反擊的策略是，首先回顧臺灣歷史上曾經使用過的文字，實際共有漢字、日文、西文、白話字、漢字白話字合用等五種，藉以彰顯臺灣文字之存在當屬多元論而非漢字單一論；其次，則是藉由史料耙梳與蒐羅，剖析臺灣白話字文學的書寫情況，並分由小說、散文與詩三方面立說，以茲證明其在台灣文學史上的存在意義，並歸結白話字文學應有之歷史地位，同時期待重新正視母語文學在臺灣文學史中的邊緣地位的不合理性。而方耀乾之作則更不僅於此，不同於呂氏題目中以「母語文學」為論述焦點，方氏所在意者則是「台語文學」，二者之指涉意義有別，台語更凸顯了「臺灣」的位置意義，且與「華語」有對峙的意味。在文中，他強調在看待台語文學的弱勢地位問題時，應該先去凸顯台語文學被壓迫的事實，指出華語文學如何從國家體制中累積資本，並且站穩教育體制之內得到強力生產的事實，此外則要擴大大學出臺灣文學史現狀的缺陷，強烈顯示台語文學被壓抑的狀態，進而解構現況促使達到多元中心論的目的。然而在進行這些看似激進的工作時，他卻提出一種策略性本質論的作法，以為在目前要避免直接與霸權對抗，而是要求弱勢者培養自我主體性，並與對方展開協商，這是因為擔心過度強化本質論會有走火入魔之虞，以上是方氏為突破台語文學困境所展開的思考步驟與執行策略。而在上述之外，論者更進一步構思台語文學史的書寫理論，所言包括：台語文學類型和範圍、文本和作家的選擇、台語文學史分期問題，以及文學史實際書寫策略等，於此可知方氏對於如何撰寫一部台語文學史所做之種種準備。

除了上述從母語/台語文學立場出發，對於臺灣文學史書寫與實踐提出反省研究之外，2009 年度的其他相關論述，還包括：吳叡人〈重層土著化下的歷史意識：日治後期黃得時與島田謹二的文學史論述之初步比較分析〉、蕭安凱〈小說中國·虛構華文·想像台灣：論王德威的文學敘事與史觀〉張誦聖〈試談幾個研究「東亞現代主義文學」的新框架--以臺灣為例〉、劉于慈〈想像世界·發現台灣：台灣現代主義文學研究的歷史考察〉、陳建忠〈臺灣歷史小說研究芻議：關於研究史、認識論與方法論的反思〉⁵等文，以上論著或針對重要的臺灣文學史相關撰述人如黃得時、導田謹二、王德威進行評述，或針對臺灣文學史上重要思潮與文類研究如現代主義文學及相關研究者、臺灣歷史小說類型論加以探討，各人側重要點不一，是皆有益於臺灣文學史研究內涵之深化。

首先，陳建忠在其文中，剖析了歷史小說中所具有的美學與意識型態的複雜對話關係，而後給予臺灣歷史小說更為細緻之分類，包括傳統歷史小說、反共歷史小說、後殖民歷史小說、新歷史小說，最後則是展演從事不同次文類文本時的

⁵ 該文收入李勤岸、陳龍廷主編《臺灣文學的大河：歷史·土地與新文化》（高雄：春暉出版社，2009），頁 10-50。

方法論，通篇言之有物，實屬多年從事臺灣與中國歷史小說比較研究後的豐富經驗所得。其次，關於張誦聖之文，則是在掌握東西方晚近有關現代、現代性、現代化與文學之間的多種研究論述後，企圖提出數種有關現代主義文學研究的新框架以供學界參考。其一是關於現代主義文學運動的發展週期，她從東亞轉譯去考察境內對現代主義接受的不均質性，這展現為不對等的空間性與有落差的時間性，此外的另一視角則是嘗試瞭解現代主義的發展週期與擴散狀態；其二，去察覺東亞現代文學做為一種現代社會體制的狀態，以及體現於背後更為複雜的語境，與文學範疇的廣義化現象；其三，尋找臺灣現代主義運動的特色，並為臺灣戰後首批以極端自覺態度，將語言視為美學資源的創作者，對於其人在中文現代文學體制內的貢獻做出肯定。而原本現代主義文學在台灣學界歷來論述已多，但面對如此重要之文藝思潮與創作美學風格，如何進行研究範式之更新與方法論、詮釋框架的重新釐定，這對於原本就是從事現代文學主義研究之要角⁶，顯然是一項具使命感的挑戰，而張氏此文體大而思精，所論具體可行，在陳述現代主義文學研究新方法論與新詮釋框架的同時，更具有展演東亞研究的操作意義與示範作用。

此外，另一篇重要的論述是吳叡人之文，他關照日治時代後期島田謹二與黃得時的文學史論述，分析二人文學史敘事結構中的歷史意識，發現二人所撰文學史，皆主張某種臺灣的主體性，但其實類似而差異；島田所建構的文學史主體，最後呈顯了母國與外地的辯證關係，而黃得時則是多種族、多語、「我即他者」的民族文學史。吳氏之作，精闢入裡，非唯洞悉島田與黃得時二人文學史論述之敘事深層結構與政治歷史思維，他更直指上述二人的文學史觀的產生都與「移民土著化」問題有關，但一從「國家主義」著眼、一則由「社會主體」衡量。而吳叡人最後還從該篇文末宕開，由此衍生了一個大哉問，一部以臺灣為主體所書寫之文學史，究竟該由「國家」或「社會」觀點著手？

相近的問題，若是回顧王德威的後遺民臺灣文學史觀，便極為有趣，蕭安凱論文指出了王德威的史觀係以「文化中國」為發想主軸。那麼，至此讓我們再度迴視前曾談及的巴蘇亞·博伊哲努，其人對此問題所持重點應是「族群」，但呂興昌、方耀乾二人論文，便是以語言文字為史觀建構之分殊主體。則，在未來若要完成一部從臺灣主體出發的文學史，又該從何下手？並應以何為據呢？2009年度的上述諸文，揭示了由於對臺灣主體性構成基礎的不同選擇，文學史撰述結果的最終面目也會有極大之差異性。

四、中國大陸學者的臺灣文學史觀與相關著述內容

有別於前兩年未將對岸學者著述納入討論，大會決議在本年度開始嘗試觀察其人在臺相關出版品，而其中，《臺灣文學評論》在2009年第9卷第1期，重

⁶ 劉于慈論文便是從研究史角度，探索張誦聖之相關研究及其意義，並從中關注研究者有關世界/中國/臺灣論述視域的變化與想像，問題意識有其新穎處。

刊了林承璜〈臺灣文學與臺灣意識芻議〉以及王晉民、吳海燕〈在台灣的中國文學一試評葉石濤的《臺灣文學史綱》〉二文；此外，尚有古繼堂和朱雙一在臺所出版的《臺灣新文學理論批評史》、《百年臺灣文學散點透視》二書。其中，《臺灣文學評論》中的二篇文章固屬於1989年之作，而古繼堂《臺灣新文學理論批評史》一書則係15年前舊作之新刊，由於所述臺灣文學發展狀態早已日新月異，而使用之論述資料亦待更新與調整，故對三者已屬過時之研究內容，本文在此不擬探討；至於三者之臺灣文學史觀則如出一轍，此由王晉民、吳海燕〈在台灣的中國文學一試評葉石濤的《臺灣文學史綱》〉一文題目，便可略知一二。

至於另一部朱雙一《百年臺灣文學散點透視》一書，雖然此書與前面論者一樣，將臺灣文學史問題放置在中國歷史進程中來衡量與理解，然而書中從「殖民與現代性」、「文化匯流與『二二八』」、「中華文化底色中的當代臺灣文學」三部分，去剖析臺灣文學與中國文學/文化之間的淵源與影響關係，卻是有意著眼於現今臺灣研究之趨向性與不足性而發，亦即朱氏實是敏感而立即性的掌握了臺灣最新研究成果，因之而能做出適時的回應與對話。

例如近年來，「現代性」成爲臺灣文學研究與文學史發展進程的重要詮釋框架，但論及臺灣文化之現代性起源，或文學與現代性之相互關係時，臺灣學者大多是由日本經驗談起，但朱氏此書則提醒中國之現代性亦是重要養分，故其〈日據初期臺灣文學現代性的發生〉、〈《臺灣民報》對五四新文學作品的介紹及其影響和作用〉二文，均有指出中國現代性對臺灣文學史亦具重要意義與價值的用意。另外，論及二二八事件，一般或將之視爲臺獨意識形成的重要分水嶺，朱氏透過〈閩廈視野中的二二八事件〉一文，說明閩廈地區對於此事件之高度關懷，並留有社論、採訪稿、親履紀聞與文學作品看來，如此不僅可以提供從臺灣境外觀看和思考二二八事件的另一種視野，更能從中發現這並非侷限臺灣此地的單獨事件，而更廣泛聯繫者整個中國社會的脈動，進而傳達了對岸對臺灣的強烈關注與連動感受。他如〈臺灣新文學中的「陳三五娘」〉或〈近年來臺灣民間宗教信仰素材小說評論—東年、黃凡、阮慶岳等的作品〉，則是在民俗視角中證成了中華文化在台灣新文學的存在顯影，但同時也引入了民俗/文學跨領域研究的新思考向度。總之，此書雖然史觀依舊，但在研究視角或分析材料，乃至問題意識上，均能別出新裁，故所論自有見地，有其可觀精彩之處。

五、結語

1990年代後期，是臺灣文學學科取得重大突破發展的關鍵時刻，此際得以正式進入國家教育體制之內，學科獨立主體性與知識體系價值獲致認可。2000年以後，成大、政大、師大、清大、台大等國立大學，紛紛成立相關系所，而在各校課程的規劃中，「臺灣文學史」往往是必修科目，儘管當時學科初創，一切仍屬草萊初闢，但在身兼研究者角色的教師們，努力憑藉所學，並透過各有所長的術業別有「專」攻模式，積極從事各式史料之挖掘，合力集體開拓了口傳文學、

文言傳統文學、白話新文學，乃至原住民文學、母語文學等範疇，於是遂能拼湊出一幅遼闊的台灣文學版圖，而這時期的台灣文學史邊界已經較稍早之前，於 1987 年，葉石濤所出版的經典之作《台灣文學史綱》更為擴大了。如果說葉氏著作，其所論及的台灣文學史內容，顯示著台灣文學史在被認知初期的邊界展示的話，那麼 90 年代以後的研究者們，除了促使、催生了台灣文學學科體制化之外，由於其人在史料的尋覓探索，以及研究範疇的新拓與耕耘，因此能為台灣文學面貌帶來更新與調整，導致了文學史邊界產生更大的位移。

不過文學史邊界的位移，不單是依賴新史料的出土，或新興研究範疇的增補，其實研究方法論與詮釋框架的重新擬定，也能引發不錯的擴大效力，進而增益台灣文學史的廣度與幅度，這從 2009 年度臺灣文學史相關研究成果來看，便可了然於心，例如從西洋、日、中縫隙談臺灣現代性之翻譯問題、臺灣旅日青年的跨域經驗，或由東亞視域研究臺灣現代主義文學，或從事殖民地文學（大東亞文學）比較論均是佳例。然而，在臺灣文學史邊界位移與擴大之際，隨著《臺灣原住民族文學史綱》的完成，以及母語/台語文學史論者質疑批判聲音的放大，另一個挑戰漢族/漢字單一中心論的多元中心文學史觀也應運而生，使人無法迴避；此外，一部以臺灣為論述主體的文學史，究竟該由國家、社會、文化、族群或語言文字來著眼？以上，2009 年度相關研究的歧異分析向度，既為臺灣文學史內涵的深化與擴大帶來希望，但也引來從事臺灣文學史書寫實踐時所會遭逢的立論基礎選擇的不安。在未來，臺灣有可能完成一部讓大家都滿意而接受的文學史嗎？研究顯示這是一條艱難而有待更多協商的道路。

◎附錄：2009 年臺灣文學史研究著述目錄

編號	編著者	單篇論文
1	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	〈國家與原住民族文學史〉，《臺灣原住民族研究季刊》，2：4（2009.12），頁 1-38。
2	巴蘇亞·博伊哲努	〈原住民族文學的發展：鳥瞰過去到未來〉，《臺灣文學館通訊》，22（2009.03），頁 62-65
3	方耀乾	〈少數文學史書寫理論e思考：以臺語文學為論述中心〉，《臺灣文學研究學報》，8（2009.4），頁 171-224。
5	吳叡人	〈重層土著化下的歷史意識：日治後期黃得時與島田謹二的文學史論述之初步比較分析〉，《臺灣史研究》，16：3（2009.9），頁 133-163。
6	吳孟昌	〈重估紀弦「現代詩」運動中的位置--以「接受反應」理論為視角〉，《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50（2009.07），頁 75-97
7	呂興昌	〈母語書寫的正常化--白話字文學在臺灣文學史上的定位〉，《鹽分地帶文學》，22（2009.06），頁 176-204
8	林積萍	〈臺灣文學場域中林良位置流變研究〉，《黎明學報》20：2（2009.01），頁 245-253。
9	張誦聖	〈試談幾個研究「東亞現代主義文學」的新框架--以臺灣為例〉，《臺灣文學研究集刊》，5（2009.02），頁 41-57
10	蔡錦堂	〈1940 年代雜誌《杏》(1943-1948)與其讀書會菁英們〉，《臺灣史學雜誌》，7（2009.12），頁 64-84。
11	劉乃慈	〈九〇年代臺灣小說的再分層〉，《臺灣文學研究學報》，9（2009.10），頁 69-104
12	林承璜	〈臺灣文學與臺灣意識芻議〉，《臺灣文學評論》，第 9 卷第 1 期，頁 226-235。

13	王晉民、吳海燕	〈在台灣的中國文學—試評葉石濤的《臺灣文學史綱》〉，《臺灣文學評論》，第9卷第1期，頁236-245。
		專書
1	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	《臺灣原住民族文學史綱》，臺北：里仁，2009。
2	古繼堂	《臺灣新文學理論批評史》，臺北：秀威，2009。
3	朱雙一	《百年臺灣文學散點透視》，臺北：海峽，2009。
4	李瑞騰、林淑貞、顧敏耀、羅秀美、陳政彥	《南投縣文學發展史·上卷》，南投：南投縣政府文化局，2009。
5	朱惠足	《「現代」的移植與翻譯：日治時期臺灣小說的後殖民思考》，台北：麥田出版社，2009。
6	柳書琴	《荊棘之道：臺灣旅日青年的文學活動與文化抗爭》，台北：聯經出版社，2009。
7	林以衡	《日治時期臺灣漢文俠敘事的階段性發展及其文化意涵：以報刊作品為考察對象》，臺北：國立編譯館，2009。
8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編	《第六屆臺灣文學研究生學術論文研討會論文集》，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09。
9	陳振盛編	《2009 南投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南投：南投縣政府文化局，2009。
10	文迅雜誌社編	《2008 青年文學會議論文集：台灣、大陸暨華文地區數位文學的發展與變遷》，台北：文迅雜誌社，2009。
11	黃惠禎	《左翼批判精神的鍛接：四〇年代楊逵文學與思想的歷史研究》，臺北：秀威資訊科技，2009。
12	徐秀慧	戰後初期(1945-1949)臺灣文化場域與文學思潮，台北：稻鄉出版社，2009。
13	謝崇耀	《百年風華新視野—日治時期臺灣漢文學及文化論集》，台南：台南市立圖書館，2009。
14	李勤岸、陳龍廷主編	《臺灣文學的大河：歷史·土地與新文化》，高雄：春暉出版社，2009。

學位論文		
1	王鈺婷	〈抒情之承繼，傳統之演繹：五〇年代女性散文家美學風格及其策略運用〉，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9。
2	吳宜玲	〈由《東方少年》月刊論五〇年代台灣的兒童文化〉，國立臺南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3	李文卿	〈共榮的想像：帝國日本與大東亞文學圈(1937-1945)〉，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4	李知灝	〈戰後臺灣古典詩書寫場域之變遷及其創作研究〉，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9。
5	沈瑩玲	〈詩與政治的對話:解嚴前後台灣政治詩研究(1977-1996)〉，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6	封德屏	〈國民黨文藝政策及其實踐(1928~1981)〉，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9。
7	侯如綺	〈臺灣外省小說家的離散與敘述(1950-1987)〉，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9。
8	高淑芬	〈流動與轉向：文季系列刊物研究（1959-1985）〉，臺北市立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09。
9	張毓如	〈乘著日常生活的列車前進：以戰後二十年間的《暢流》半月刊為考察中心〉，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10	陳淑容	〈戰爭前期台灣文學場域的形成與發展：以報紙文藝欄為中心（1937-40）〉，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11	黃冠翔	〈台灣作家的香港書寫研究（1950-2008）〉，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2009。
12	楊書瑋	〈台灣清治末期（1871-1895）散文中的文化論述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13	趙勳達	〈「文藝大眾化」的三線糾葛：一九三〇年代台灣左、右翼知識份子與新傳統主義者的文化思維及其角力〉，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14	劉于慈	〈想像世界·發現台灣：台灣現代主義文學研究的歷史考察〉，中興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15	蔡佳潏	〈1930年代台灣與中國大陸的「文藝大眾化」論述探討〉，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16	蕭安凱	〈小說中國·虛構華文·想像台灣：論王德威的文學敘事與史觀〉，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17	蘇世昌	〈1920-1937 台灣新知識份子思想風貌研究〉，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9。
18	李敏忠	〈殖民地風景的書寫：1930年代臺灣白話小說文體風格研究〉，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9。